



义和团资料丛编

北京的隐士

——巴克斯爵士的隐蔽生活

义和团资料丛编

北 京 的 隐 士

——巴克斯爵士的隐蔽生活

【英】休·特雷弗——罗珀著

胡 滨 吴乃华 译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 11.75印张 257千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

书号 11206·117 定价 2.90 元

Hugh Trevor-Roper

HERMIT OF PEKING

—THE HIDDEN LIFE OF SIR EDMUND
BACKHOUSE

Alfred A. Knope

New York, 1977

译者说明

巴克斯(又译白克浩司)是英国汉学家,在中国居住了将近半个世纪,因与另一位英国学者濮兰德合著《慈禧外纪》一书而闻名于世。该书第十七章收录了巴克斯于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所“发现”的景善日记的译文。景善日记自公开发表以来,国内外学者聚讼纷纭,有人誉之为“信史”,有人斥之为“赝品”,由此而引起了另一个问题:该日记的“发现”者、以“隐士”著称的巴克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一生干了些什么?

本书作者特雷弗—罗珀是英国牛津大学近代史教授。为了查明巴克斯的生涯,他不辞辛苦地翻阅英国政府和各有关公司的档案材料,并在好几个国家搜集有关人物的书信文件,以确凿的事实揭露了巴克斯的神秘的一生,不仅提出巴克斯伪造景善日记的充分证据,而且还说明巴克斯在政治上也是一个一贯招摇撞骗、弄虚作假的大骗子。对于研究近现代史特别是义和团运动史的人来说,本书是很值得一读的。

本书是外国资产阶级学者撰写的一本著作,其中有不少地方对中国近现代史作了歪曲的说明,请读者阅读本书时加以批判。本书第十三、十四两章介绍了巴克斯回忆录中所包含的某些荒诞淫秽的内容,我们在翻译时删去了其中最猥亵的词句,

但仍保存了原书的基本面貌，其余各章均未作删节。对书中的人名、地名及事件，我们作了一些简要的注释；至于书中原有的注释，我们都加上了“作者原注”字样，以示区别。

我们在翻译本书时，得到许多师友们的帮助；齐鲁书社编辑部的同志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方便条件，并给予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谨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译文中可能存在不少的错误和缺点，我们恳切希望读者提出批评意见，以便改正。

1983年国庆节于济南

序 言

在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的荣誉名册上，即刻有那些最慷慨大方的捐助人姓名的新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大理石碑上，有“埃德蒙·巴克斯从男爵”的名字，以及汉弗莱、格洛斯特公爵、博得利爵士、劳德大主教、格罗姆韦尔、梅隆以及洛克菲勒基金会等名字。二等从男爵埃德蒙·巴克斯爵士（1873——1944）确实应当在那个名册上享有他的地位，因为他于1913年把他收藏的一万七千卷中文书籍和手稿捐赠给波德林图书馆，我们深信其中有些是十分罕见的和很有价值的，有些则是很难得的孤本。此后八年中，他又捐赠了一万卷书。按照专家们的意见，仅通过那些赠送的书籍，就使得巴克斯丛书成为欧洲最好的中文藏书之一。他赠送了这么可观的一笔礼物，应当受到适当的重视。它也提出了一些问题。谁是这些书籍的捐献者？他是怎样得到这些书籍的？是什么动机驱使他如此慷慨大方？任何一批巨大藏书的范围和来源都构成了其历史的一部分；由于我们尊重那些捐赠人，所以我们也应当试图了解他们，作为对他们的慷慨大方的一个正当认识。

埃德蒙·巴克斯爵士在晚年的时候，非常想要人们了解他的真实历史。那时，他写了两卷回忆录，以供发表——他经常坚持他那个发表的愿望。这些回忆录未必能够发表，因为它

们与目前已发表的关于他的一生的唯一公开记载（他的朋友丹比夫人在《英国人名辞典》中所写的简明条目）大不相同。我在提供与巴克斯爵士及丹比夫人所写的完全不同的第三份记述时，希望我将更接近于真实。在本书中，巴克斯爵士也许显得不象丹比夫人的文章中那么受人尊敬，但至少比他本人所要使我们相信的更受人尊敬得多。

巴克斯爵士是一位汉学家。他在中国博得名声并得到他的那套藏书。如果他名扬四海的话，那是因为他与濮兰德合写了两本书：1910年出版的《慈禧外纪》^①和1914年出版的《清室外纪》^②。前者是关于清王朝最后一个重要统治者的第一部学术性传记，长期以来被视为一部名著，西方作家经常把它作为权威著作加以引用。在直接提供的资料、描写细节的生动以及文笔的流畅和通俗易懂等方面，没有任何著作能够替代它。后者同样是一部根据明朝皇帝及其后继者——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即清朝皇帝的宫廷历史情况而编成的资料选辑。

为了对巴克斯的一生作一概述，先谈谈唯一公开发表过的资料，即丹比夫人撰写的那个简短的传记，是合适的，确实也是必要的。丹比夫人是个画家兼作家，1926年至1942年居住在北京。她认为巴克斯爵士是她在那里最熟悉的朋友之一。她在根据“私人了解”所撰写的关于巴克斯的文章中，叙述了他的直系亲属，他所受的教育，对语言的特殊才能，在中国的长期居住，在使馆担任译员，受命担任教席，发表的著作，对波德林图书馆的慷慨赠书，以及人们给予他的荣誉。丹比夫人告诉

^①原著名为《慈禧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中译本名《慈禧外纪》，陈冷汰等译，中华书局1914年出版。

^②原著名为《北京宫廷编年史和回忆录》，中译本名《清室外纪》，陈冷汰等译，中华书局1915年出版。

我们：尽管欧洲方面给予他高贵的职务，“但中国召唤他”，于是他就留在中国了。我们获悉，“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变成了隐士，把他的全部时间用于研究和写作。“他在北京西城的寓所中，过着中国学者的生活，甚至穿着中国的长袍。他慢慢地断绝了与欧美各国朋友们的一切社会联系，只接待他们中间的两三个人，于是他获得了某些古怪的名声。但是，他继续看望他的中国朋友，其中有些是学者、官员以及前清皇室成员。”看来，巴克斯正从事关于一部英汉辞典和关于清朝皇帝传记的写作。但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使他未能完成这些著作。

“1937年，当日本人侵入北京时，巴克斯被迫离开他在中国的寓所，到前奥地利公使馆大院避难，后来又搬进英国使馆区的一幢房屋内居住。日本人对所有书面文献极为怀疑，放火烧掉了他的文件和手稿，其中包括辞典和传记。因此，将近半个世纪的贵重资料和劳动都化为灰烬。”丹比夫人在结尾时写道：巴克斯在他的晚年“转向了宗教”，成为一位罗马天主教徒。当1941年12月日本与英国之间爆发战争时，他拒绝了被遣返回国的建议，于1944年1月8日死于北京法国医院。

对于这个正式的报道，丹比夫人在1955年发表的一部关于她本人在华生活的回忆录中，又补充了一些生动的细节。在该书中，巴克斯的特色是一位仁慈的、不关心周围事务的教授，“对中国历史十分熟悉”，留着很尊严的白胡须，甚至在炎热的夏天也穿着那件很长的、庄重的白色绸袍，使他很象是早期清廷中的一位耶稣会士。这些关于外表的详细情况，给那位侨居中国而已经中国化的英国从男爵创造了一个令人感到愉快的形象，但它并没有使我们对巴克斯的个性有任何更多的了解。我们仍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他住在北京？他进行秘密研究

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他的隐居生活的动机是什么？这位神秘的人物仍然是神秘的。

关于巴克斯的神秘事件之一，是环绕着那本中文日记即景善日记而产生的。象他告诉我们的那样，该日记是他本人于1900年义和团起义期间发现的，后来他把它翻译出来，收入《慈禧外纪》一书。现在，该日记的原稿存于英国博物馆。关于这部著作的真实性问题的争论，当他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但从来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已故的伯塞尔^①在1963年出版的他的权威性著作《义和团起义》一书中，专用一个附录讨论该日记，认为如果它是真实的，对历史学家来说，它就一定会被认为是一件不可替代的第一手资料。他得出结论说：该日记是伪造的，但他不能够断定是谁而且为了什么目的伪造它。丹比夫人在她写的关于巴克斯的简短传记中，没有提到这个争论。然而，对巴克斯的品质的最终评价，必须取决于它。我冒昧地认为，我所提出的证据将解决那个结论。

我承认，如果不是一个奇妙的机会，我本来会十分乐于让巴克斯隐藏在他自己制造的神秘的云雾之中。1973年夏季，一位著名的瑞士科学家、国际某医学研究机构的主任写信给我，以比较谨慎的措词，问我是否愿意接受他最近得到的巴克斯撰写的一部重要著作，如果我认为合适的话，把它转交给波德林图书馆保存。我的那位通信人在说明他的要求时，附有关于那个文献的历史以及两位看过它的著名学者写的书面意见。这两位学者认为，它具有很大的文学上的和历史上的价值，虽然从他们的报告看来，它也多少有些猥亵，这是很清楚的。那个文献

^①伯塞尔（1896—1965），英国人，剑桥大学毕业，1920年来华，1926年赴马来西亚任职，1947年以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咨询者资格再度来华，1949年返国。新中国建立后，他曾来华访问。

被指定送往波德林图书馆，自然与该作者已经送去的著作和原稿等藏书放在一起。但是，他们认为，它首先应由一位英国历史学家进行鉴定；我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们相信，我同巴克斯一样，曾在英国保密机关工作过若干时候^①。我接受了这个建议。由于某种原因，他们觉得不便把这样一包捆好的文献交付邮寄，所以当我于1973年8月碰巧路过巴塞尔机场时，他们郑重其事地把它交到了我的手中。

我回到牛津大学后，打开那包捆好的文件，发现里面有两部著作，整齐地打印在四开纸上，各装在一个中国制造的很雅致的书套内，而且在每一个细节上（献辞、目录表、图解等）都已准备好供排版印刷之用。这两部书都是用英文写的：第一部书名为《悠悠往事》；第二部书用了一个法文名字，即《满族人的衰落》，上面任意点缀着汉字。加在每本书的前面的，是对它的严格真实性的庄严声明，有些人可能说它过于庄严了。我对它的印象良好，所以决定立即着手工作，首先从那本看来内容更充实的《满族人的衰落》开始读起。

我没有读多少，就了解了那位保管这些著作的瑞士人不愿意把它们交付邮寄的原因。我问自己：如果一位正直的、工作认真的海关官员打开并阅读这些著作，他将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呢？它们肯定将被没收，但是，依照法律追查寄书人和收件人，也许就不很方便了。因为这些著作不是一般的猥亵作品，我读这些著作的时候，想起了西蒙斯^②的警句，当他带着同样惊讶和沮丧的情绪发现罗弗（笔名科沃男爵^③）描写色情的威

^①本书作者特雷弗—罗珀曾于1939年至1945年在英国陆军情报机关任职。

^②西蒙斯（1865—1945），英国诗人及批评家。

^③罗弗（1860—1913），英国作家，行为古怪，以著有自传性的幻想小说而闻名于世。

尼斯文学时，指责它们说：“这些文学作品也许是阿雷蒂诺^①在卡萨诺瓦^②的命令下写的。”当我初次阅读巴克斯的回忆录时，这种相似的情况立即使我感到吃惊；后来研究他的奇怪性格时，它又时常在我眼前重现。最后，我终于发现它比我有理由预料的更近似得多。

但是，当我阅读这两部著作时，使我大吃一惊的，还不仅在于那些猥亵的语言，更重要的是书中所谈的事情。巴克斯的严格的回忆详尽记载了一种极为特殊的生活，并且在许多方面触及到维多利亚女王后期的英国和清朝末年的文学的及社会的历史，所以我们一旦阅读它们，便感到不得不继续读下去。阅读这些著作并不是强制性的，相反，隐藏在这些著作背后的那个人物性格使我困惑不解。正象西蒙斯被那些猥亵的威尼斯作品所驱使，去探索作者的难以捉摸的和十分荒谬的性格一样，我也感到被这些猥亵的回忆录所驱使，去研究那个曾经创作它们的同样难以捉摸的十分荒谬的性格。我开始了可与西蒙斯的《科沃研究》^③相媲美的《巴克斯研究》。

此外，还有一个实际的动机。我自问：如果我不试图尽力审查这些文献所包含的令人惊讶的历史说明，我怎么能够允许这些爆炸性的文献收藏在波德林图书馆或其他公开藏书的地方呢？因为这些历史说明，无论是真实的或虚假的，都同样损害了那位专心致志的学者的公认的形象，而且意味着对巴克斯作为学者和图书赠送人的著作提出严肃的疑问。

^①阿雷蒂诺（1492—1556），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作家，他的作品既生动、真实，又有受贿行为。

^②卡萨诺瓦（1725—1798），意大利的冒险家和作家，因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他的放荡生活而著名。

^③西蒙斯的《科沃研究》一书出版于1934年。

但是，如果要审查一位隐士的自传，究竟根据什么客观资料来审查它呢？最初，我试图沿着回忆录本身提供的线索进行下去。巴克斯在回忆录中，曾叙述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同英法两国的一些文学家以及英国政治家具有密切友谊，甚至具有亲密关系。情况既然如此，似乎有理由认为，在他们的书信文件中将有关于巴克斯的某些线索。但是，当我检查可以看到的他们的书信文件时，却发现这些著名人物对这个问题都显然保持沉默，也许有些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就我所能见到的材料而言，他们根本没有提到过巴克斯。此外，巴克斯回忆录中的某些说明或自白是很不平常的，所以我认为，不完全信赖任何仅出自回忆录的说明是慎重的。

因此，我决定尽量搜集有关巴克斯的过去的事情，甚至完全从客观资料作为出发点，与他的回忆录无任何关系。我同巴克斯在世时曾在中国居住过的那些朋友们商量，不久便发现自己与许多很可能见到而且有时曾经见过这位难以捉摸的从男爵的人们有信件往来。阿克顿爵士叫我去找那位此时正在香港的北京法国出版商魏智先生，他曾经出版了《慈禧外纪》一书的1939年北京版，因而与该书的作者发生过联系。魏智先生叫我去找前《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刘逸生先生，他现已退休，虽然已经九十岁了，但头脑仍很清楚，住在泰晤士河旁的马洛地方。刘逸生先生除了给我提供很有用的情报之外，还叫我去找好几位已退休的外交官，他们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曾在北京任职。丹比夫人用生动的笔调补充了她那些已经发表的记述。我的朋友马杰里先生证实了某些已经向我提供的细节，并且增加了一些很有吸引力的个人回忆。我非常感谢所有这些人的帮助，但是，他们到底能够说出些什么呢？他们可以

使那位难以捉摸的人短暂地活灵活现。他们可以证实确有其人。他们也许对他有过匆匆一瞥——看见他经过，坐在一辆黄包车上，穿着他的中国式衣服，急急忙忙地遮住他的面孔，以免被那些世俗的西方人看到他。他们也许因某些必要的事务（一部译作、他的津贴和安全）而见过他。那时，他们注意到他对交际具有强烈的紧张恐惧情绪，他怀疑处于被支配地位，但同时也注意到他总是那么彬彬有礼和具有魅力，他的文雅举止和温柔动作。或者他们仅仅听说过关于这位居住在北京内城的传说中的隐士。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对他的真实性格，他为什么来到中国，或他在中国干了些什么，有任何想法。他是一个恪守惯例的人——由于“恪守惯例”那个词含有某种固定性，所以更确切地说，他是一个经常行踪诡秘的人，象是某个胆怯的夜出活动的动物，它住在公园的一个边远的角落里，并且从被忘却的年代以来就已经住在那里了，但人们很少见到它，虽然在发生干旱或饥荒的时候，人们很惊讶地看见它一两次，但它已经回窝吃东西去了。

我为了试图识破这种表面的印象，自然去寻找那些书信文件。但是，巴克斯没有留下个人的任何书信文件，而且有人告诉我，巴克斯的家庭也没有书信文件。他本人所写的并保存到1939年为止的一切东西，都在那一年发生的一次神秘的大破坏事件中失踪了，丹比夫人也许太轻率地把那个事件归咎于日本人。^①从那一天以后，只剩下了回忆录。然而，巴克斯在捐赠

^①作者原注：丹比夫人说那个事件发生于1937年，从而把它归咎于日本人的压力。她显然混淆了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事件：巴克斯于1937年在日本人的压力下暂时撤离以及于1939年舍弃他的寓所。他的书信文件是后一情况下被毁坏的；没有证据表明日本人曾在毁坏那些书信文件中插了手。这些事将在后面加以说明。

他的巨大藏书时，毫无疑问，他一定同一个机构通过信，即波德林图书馆。因此，我转而查阅该图书馆的档案。我在那里获得了报偿，找到巴克斯消失在几乎完全东方式的隐居生活之前关于他的生活和活动第一份可靠证据。

这个证据主要是有关巴克斯藏书的两本通信集，由先后担任图书馆管理员的两个人保管：1919年前任管理员的马登及其继任人考利。这两本通信集对巴克斯在1912年至1923年间的活动提供了新的和令人感到不安的说明，并且加强了我对他的回忆录进行批判性研究后已经被迫得出的那些结论。但是，这两本通信集当然没有追溯到1912年以前的情况，那一年巴克斯因为捐赠大批中文书籍和手稿，初次同波德林图书馆接触。那时，巴克斯已经四十岁了，据我推断，他至少已经在中国住了十五年，却没有任何文字记载。所谓“没有文字记载”，那是说除了他自己的回忆录之外，而回忆录本身由于正在接受审查，是不能用来作为资料的。

由于那些早年的公共档案都没有提到巴克斯，所以很显然，我必须寻找私人的文件资料。有两个人的通信应有助于说明1913年以前巴克斯在中国的生活。其中一个人是他的合作者濮兰德，同他一起合著《慈禧外纪》和《清室外纪》那两本书。他们初次合作时，濮兰德是《泰晤士报》驻北京的记者。另一个人是濮兰德在《泰晤士报》系统中的上级和竞争对手、著名的关于中国的政论记者和专家莫理循博士。

莫理循既然认识住在北京的每一个外国侨民，据我看来，如果他不认识巴克斯，那似乎是不可理解的；由于他从来不是小心谨慎地约束自己，他不在某个时候表示他对巴克斯的看法，我认为似乎是不大可能的。因此，我感到惊讶和失望，在珀尔

先生写的关于莫理循的传记中，竟没有找到关于巴克斯其人的任何说明，甚至关于莫理循和他的同事、巴克斯的合作者濮兰德的关系也未提及。然而，从刘逸生先生那里了解到莫理循本人的日记。该日记虽然是准备发表的，但正是由于他直言不讳，所以它被认为不能发表，我没有因此感到泄气。我请我那位当时在澳大利亚的朋友阿谢德帮助我查看关于收藏莫理循原始文件的某些箱子，因为这些文件现在都存放在悉尼的米切尔图书馆。他惠允这样做，他的抄本对我来说是十分宝贵的。它们提供了关于巴克斯在北京活动的最早证据，后来罗惠敏博士编的莫理循通信选集这部学术性著作补充了这些证据。该书第一卷出版时，我的这本书稿已交到出版商手中。

濮兰德的私人书信文件如果有任何部分仍然存在的话，将比莫理循文件甚至更为重要。莫理循死于1920年；濮兰德比巴克斯活得长久些，死于1945年。但是，究竟有没有濮兰德的任何书信文件呢？最初，我认为是没有的，因为我已经提及的伯塞尔于1963年在他写的《义和团起义》一书中写道：他“至今尚未能查到濮兰德的任何私人书信文件”。然而，不久我便获悉，1970年，即伯塞尔去世后五年，濮兰德的遗稿保管人已把他的书信文件赠送到多伦多大学，目前在费希尔珍本书图书馆可以找到。因此，我写信给该馆的图书管理员，承蒙他把我所需要的所有文件制成缩微胶卷送给我，其中包括濮兰德的大批信件、他那记载很详细的日记以及未完成的回忆录。这些丰富的档案材料是迄今我所发现的最有价值的唯一原始资料，再加上莫理循的书信文件，就使我能够重写巴克斯自1899年至1914年间几乎不间断的传记，有时还超出那些年代。

于是，这三种原稿资料——波德林图书馆文件、莫理循文件

和濮兰德文件——为我提供了对巴克斯爵士自到达中国时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的生活进行独立研究的基本资料。继那些资料之后，还有第四种资料在巴克斯的最后赞助者和保护人、瑞士驻北京总领事霍普利博士那里，他是巴克斯回忆录的“校订者”和唯一的倡导者，该回忆录已在巴塞尔机场交给了我。霍普利博士的贡献将在适当时候变得很明显。他在这件事情中起了重要作用。

当我发现自己掌握了这四种主要资料的时候，我相信我能够重写而且也许能够说明巴克斯的生活情况。但是，不久就很明显，那种生活情况，不管它和回忆录中所描述的生活有什么联系，比这些文件中的任何一种所公开承认的，也许甚至比这些文件的任何一位作者所了解的，更特殊和更神秘得多。濮兰德、马登、考利、霍普利等虽然对巴克斯性格的独特表现感到惊讶，但都不十分了解他的真正性格或全部经历。甚至具有初步印象的莫理循，也只了解到那个人物的某些明显的方面。如果我真想发现他的行为的动机，就必须更加深入进去。幸亏这四种主要资料之一给我提供了某些重要线索。

这个关键性的文件，是莫理循在去世前两年起草的一份关于巴克斯在1914—1918年间从事出色企业活动的简要报道。如果没有这个文件，我将永远不能够越过第二道障碍。我迄今读过的资料都丝毫没有提到这些活动，所以在初次阅读时，对我来说，正如对当时的其他人一样，似乎是令人很难置信的。检验这些活动的唯一办法，是审查那两家已表明雇用巴克斯充任它们在华代理人的公司的档案，如果可以得到这些档案的话。这两家公司是克莱德赛德的布朗造船工程公司和纽约的美国钞票公司。因此，我向这些公司提出了询问。

克莱德赛德的布朗造船工程公司是伦敦布朗公司的子公司；作为这样的子公司，它只享有很少一点自主权，所以有关档案很可能由伦敦的母公司保管。我发现的绝大多数证据表明，巴克斯的活动在任何情况下都由该母公司控制，它的董事长是麦克拉伦，即阿伯康韦一等勋爵。这家母公司现在仍继续存在，但我查阅有关档案的尝试却遭到了坚决的阻拦。该公司通知我说：它们几乎肯定未藏有回溯到那些年代的档案，而且无论如何没有时间“检查”过去的文件，以便寻找它们。然而，我发现：一些有关该公司造船活动的文件，不是仍存放在克莱赛德的子公司，便是当1968年它并入上克莱德造船财团时被送至该处；后来，当该财团破产清算时，这些文件被送入格拉斯哥大学图书馆。该馆的档案保管员莫斯先生好心地为 me 检查了档案，由于他的帮助，我才能够至少重写关于巴克斯受雇于该公司七年期间的活动的概况。根据该公司主要档案作较全面的叙述，无疑将更丰富多采；但是，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

我向这两家公司的第二家即美国钞票公司提出的请求，受到了很不相同的接待。该公司董事长韦茨恩先生对此事表示直接关心，亲自吩咐为我检查该公司的档案。公司的调查员泽克先生进行了很彻底的检查，给我提供了一系列很吸引人的档案副本，它们证实并补充了莫理循文件中所揭示的情况，使我能够较详尽地说明巴克斯与中国钞票事件的真相。后来，埃尔文先生又促使我注意证实同此事有关的第三种资料，即外交部档案中名为《埃德蒙·巴克斯爵士事件》的案卷。经检查后，我发现它是根据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爵士的命令于1917年10月开始设置的案卷。关于开设该案卷的情况，以后在本书中将说得很明白。目前说明这一点就够了；该案卷为我提供了关于那个